

中国需要更深层次的收入分配改革

张莱楠

在中共十八大的工作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实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引起了全球关注,成为最具分量的关键词。

财富分配失衡大于收入分配失衡

包涵实现“两个同步”和提高“两个比重”在内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人们最期盼的重大改革,不过,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初次分配的收入分配调节,还涉及二次分配的财富分配调节。

一般而言,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个方面,收入差距是一种即时性差距,是对社会成员之间收入的比较;财富差距则是一种累积性差距,是社会成员之间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对比。从税收本质上看,个税是对收入所得一段时期的流量征税,并非对额度巨大的资产存量的调整。因此,并不能根本上改变财富分配失衡的格局。

当前,中国财富分配失衡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收入分配的失衡。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以年均12.3%的加速度

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两倍。招商银行与贝恩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过去两年中,资产规模在1000万至5000万与1亿以上的高净值人群的增速较资产规模在5000万至1亿的高净值人群的增速更快,而再进一步通过分析中国富裕人群的资产构成来看,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富裕人群人均拥有房产3.3套,房产价值占全部资产的72%,房地产已经成为主导财富分配的主渠道。

财富分配的失衡会比一般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危害更大,因为它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不同收入阶层在财富创造和财富积累上的差距,即所谓的“马太效应”,它将通过代际之间的财富转移,强化代际之间的分配不公。

由于资本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加之富人阶层拥有的金融资产过多,就会出现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样一来,可能导致投资与消费的内生性失调。因为根据不同阶层的消费弹性结构,收入层次较低的阶层消费偏好高于高收入阶层。因此,贫富差距越大,经济将越依赖资本积累和投资,而消费将被边缘化,这将导致资产投资泡沫。而且,贫富的代际转移也很可能将一个社会的贫富状况固定化、结构化。

从四方面消除“马太效应”的累积

如何避免这种财富分配失衡的“马太效应”不断累积?中国的确需要更大的制度性改革,不过,所有的改革都是一种利益的调整,会触及重重积弊,因此绝对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系统工程。

首先,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扭转初次分配失衡。初次分配包括资本所得、政府所得和劳动所得等三个部分。在当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较强的政府控制力需要政府税收的高比重;而当前企业的高利润是源于很多企业的垄断利润。中国产业呈现出超重工业化与资本密集化,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近十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总量持续高速增长,但是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份额却呈现下降趋势。1997年至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从52.7%下降到39.74%,下降了近1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资本回报占GDP比重不断上升,提高到2006年的30.6%。我国劳动者报酬的GDP占比不仅远低于所有发达国家,并且低于同处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因此,政府必须通过大幅减少宏观税负,以及建立国企分配制度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措施才能实现利益的重新分配。

其次,打破垄断,缩小行业间分配差距,必须着力建立一种有利于提高和维护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劳动效率的社会公平机制,所谋求的不是取得收入和财产分配的均等化,而应是取得收入的机会均等和创造收入过程中条件的均等。这里主要是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改革的步伐缓慢。一直以来,金融、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备受公众诟病,并成为分配制度改革中非常大的一道阻力。我国行业收入差距最高与最低的比值在逐年拉大。在我国初次分配中,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而这种差距约1/3是垄断因素

造成的,因此必须加快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改革,对部分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实行双重调控,缩小行业间工资水平差距。

再次,要强化税收对贫富差距的调节机制。去年,调高个税起征点的税收改革已经启动,但这只是调整收入分配,国家要建立更加完备的财产税调节体系。在发达国家主要是依赖税收对财富分配的调节机制,遗产税、不动产税、固定资产税等对财富分配的调节税收体系已经相当成熟,世界上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住房征收房产税,把房产税作为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重要工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房产税可以通过对贫富差距的重要环节——房产等不动产方面的调节,在扭转财富分配失衡方面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

最后,要通过财政支出的扩大提高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国民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0%-30%。比如,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2007年政府的福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高达68.8%、58.7%、56.7%和57.1%,而相比之下,我国财政支出中的社保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还有一定差距。

因此,政府和社会要提供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各种公共产品的服务,弥补贫富差距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要改变对公共品提供的优先次序,加大教育制度、就业制度以及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构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有效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当前,解决财富分配失衡唯有进行全局性的制度改革,分配失衡才能有效缓解。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WTO倒逼中国电影进入工业化时代

今年2月,中美双方就解决世界贸易组织(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根据协议,中国将美国进口大片的限额由每年20部提高到34部,这意味着平均每个月将有2到3部美国大片进入中国。根据广电总局发布的数据,上半年进口电影票房为52.7亿元,同比增长了90.4%,而国产电影的票房为28亿元,下降4.3%。面对气势如虹的好莱坞大片,国产影片如何抗衡?本期《新财富夜谈》特邀华谊兄弟董秘胡明、光线影业副总裁徐林、电影基金创始人王国伟,共同剖析中国电影产业。

王国伟:电影最近要拍《藏地密码》,六集,每集投资在1.2亿到1.5亿美元。我们要借鉴好莱坞模式,在生产流程上的每个人,编剧、导演、演员都是一个零件。在和好莱坞的主流公司合作中,他们在做,我们在旁边看,看得有一点眼花缭乱。通过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意识到导演体系必须去掉,制片人体系必须到来,这样电影工业时代才会到来。

叶檀:现在的电影业还是一个英雄主导的时代,既做制片,也做导演,讲故事,什么都要会。这样的英雄其实是很少的,而且没有可逆的风险,万一他生病了,情绪不好了,谈个恋爱了,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专业分工,各司其职,一个制片人体系取代导演体系的电影工业时代。

国内电影投资是高风险行业

去年中国电影拍摄了791部,其中约260部上了院线,其他的都躺在仓库里。徐林称未公映的影片大多是通过电视或网络渠道播映,其中不超过30部电影能赚钱。按照目前国内电影业内的平均投资情况计算,700部影片每部平均投资额在1000万元左右,总投资额在70亿元,亏损40亿元,90%的投资都是亏损的。有电影投资人直言不讳,指望在中国投资电影赚钱是不可能的。但尽管如此,目前仍是热钱满天飞。

叶檀:大家进去前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一种心态是,我热爱艺术,亏了也是为艺术做贡献,心中无憾。第二种呢,你根本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事了,电影亏本了,你发觉导演买房子了,演员度假去了,大家都过得很滋润,就你亏钱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如何控制风险呢?

王国伟:电影就是一个私募投资,但是现在缺乏监管,很多钱其实是被操盘手赚到了。好莱坞用于监管的费用要达到8%,从电影制作到后期宣传、发行、销售,到最后收款。这钱不是某一个导演,某一个制片说花多少就多少的,要分期投资。好莱坞有三大收款公司,它们的信誉比银行还高,此外还有强大的律师体系,包括卡梅隆也必须带着律师来谈生意。人们能相信这样的体制,投钱能收回到钱。在中国有二三十只非常巨大的基金,比如鼎晖弘毅,它们有钱但不敢投电影,为什么呢?因为它们要拿出8%的监管费,而自己的管理费就只有2%。所以最好有专业的电影基金公司,专业的人员去管理,才能带来真正公平的产业投资的开始。

胡明:我2005年到华谊,一直在做电影的融资。华谊上市前那一轮融资特别困难。为什么那时候演员会买,他看的是公司的面子。我们在2006年拍《集结号》的时候,跟招商银行贷款5000万,我往深圳都跑了十几趟,喝大酒不知道喝了多少,最后才贷了5000万。6年后的今天,非常多的资金想进到这个行业,没有我融不到的钱。我觉得这是一个潮起潮落的过程,如果拍了六七百部电影,大多数都会赔钱,这些资金就会退下去,然后进入到一个理性科学的轨道上来。

叶檀:我听说《唐山大地震》、《画皮2》的电脑特技都是国外的一流团队来制作的,据说那个钱谁去了,是吧?

胡明:还好吧,现在3D普

叶檀:刚才说WTO电影业要开放,到2016年咱们国门一打开,好莱坞的电影冲过来,大家担不担心?现在每年34部电影咱们已经应接不暇了。

徐林:这是电影业同仁都担心的事情。国家给我们创造了很多条件来保护国产电影,包括国产片当期保护月,国产片资助的税收政策、优惠政策。作为中国电影本身来讲,不应该是固守,应该是开放走出去。

王国伟:打个比喻,我国的电影工业就像30年前的汽车行业,现在如果不跟世界级别的公司合作,那就是闭门造车。我们受到冲击以后,生产技术、营销能力、价值观等逐步和好莱坞统一,到那个时候,可能国产电影才会好。电影提倡中国的文化元素、好莱坞的编导、好莱坞的制片、全球发行、英文拍摄,以此来使影片走出去。

合拍片的模式并不是最近才在国内电影业流行起来的。解放后,尤其是上世纪80-90年代这股风潮尤甚。跨国合拍其实是国际普遍使用的融资方式,尤其在欧元区,国家间投资、制作、发行渠道基本打通,少有片子是一国独立投资。

叶檀:我听说《唐山大地震》、《画皮2》的电脑特技都是国外的一流团队来制作的,据说那个钱谁去了,是吧?

胡明:还好吧,现在3D普

《新财富夜谈》是一档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制作、每周日晚23:17在甘肃卫视播出的高端财经周播访谈节目,由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女士担任嘉宾主持。本版每周一回放该节目主要内容,敬请关注。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子邮箱至pp118@126.com。

盲目种植是农副产品经常滞销的主因

禾刀

最近一个月来,农副产品滞销的新闻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滞销品种更多,除了蔬菜,还有水果。而滞销的量也格外大,动辄数以万斤计。农民大多开始改种投入较少的玉米、红薯,甚至撂荒出去打工。

丰收不丰产,部分农副产品滞销已经成为年度一景的常见现象。为最大限度减少农民损失,一些地方的应对之举是,要么通过媒体等渠道拓展商机,要么动员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迅速掀起采购滞销农副产品的高潮。其情至诚其行可嘉,但这样的关爱之举至多只是减少损失,不足以形成增收的健康机制。总体看来,农副产品常常滞销,主要因为面临三大掣肘。

首先是盲目的规模化种植。一些地方为农民尽快走上富裕道路想了不少办法,其中就包括鼓励种植经济作物,提高农副产品的价值。正是在这些行政力量的强力推动下,各色种植基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地,什么基地都有。以连年滞销的柑橘为例,全国十多个种植省份没有哪一省自甘让柑橘基地的堂皇头衔。不少地方为了造势,频频举办这节那节,聘请要价不菲的形象代言人,评比种植能手……2011年,全国19个省柑橘种植面积达到3200万亩,总产量达2650多万吨,照此产量推算,全国13亿人人均消费41斤柑橘,才能实现产销平衡。如果考虑到年龄、地域等诸多原因,

这个数字还必须呈几何级增长,这实际表明柑橘市场竞争压力远超过想象。在这样的一个产能旺盛市场有限的行业里,丰年滞销的宿命其实早已注定。

其次是市场链条过短。在一些地方盲目推崇基地化种植,扩大规模的同时,相关配套营销体系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从一些地方的集市之举来看,也只是再呼吁经销商采购。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农作物的规模化种植已从田间延伸至商场的柜台,农民只管种与收,遍布各地成立的农作物产销经济实体负责销售,比如日韩等国的农协。相比之下,我国只重视规模化种植,市场销售则成为普遍性短板。

再次是中间环节成本过高。首当其冲的便是运输成本。近年来,虽然国家建立鲜活农副产品公路运输“绿色通道”,但中间过高的运输成本依然大幅抬高了农产品价格。一些地方蔬菜与水果价格贱到只有一两毛钱,但在市场上消费者很难享受到这样的实惠价格。有的农副产品市场上并非没有需求,而是过高的中间环节成本成了拦路虎。

激发社会爱心力量,帮扶农副产品滞销的农民,这当然是一个温暖社会的必然表现。但爱心毕竟有限,不可能使农民真正顺应市场规律,通过经济作物种植走上致富之道。某种意义上,需要更多爱心长期关注的行业,恰恰证明其有待加强和完善。笔者倒是觉得,因应当下农副产品频频滞销现象,有必要围绕上述三大掣肘问题,针对性地研究对策,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建立健全农副产品从地头到餐桌的链条,以改变当前这种农副产品生产种植与市场严重脱节的现象。

猪肉价格连跌四周



猪肉价格跌四周,通胀随之稍低头。市场行情很纠结,猪农心事多忧愁。分散养殖难避险,集约经营可纾解。产销模式要改革,破除涨跌伤农。

朱慧卿/漫画 孙勇/诗

股市也要制订投资者收入倍增计划

皮海洲

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内容。而为实现到2020年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无疑让国人为之振奋。但为实现这一目标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这似乎戳到了中国股市广大投资者的痛点。虽然财产性收入包括了利息收入、股息与红利收入、出租房屋收入、知识产权收入、保险收益、彩票收益等诸多内容,但对于股市里的投资者来说,最主要的财产性收入莫过于股票的投资收益了。但提起股票投资收益却总是让投资者感到难受,因为从总体来说,投资者在股票里

的投资收益是负数。投资者的财产性收入不仅没有增加,相反投资者的财富还在股市里被蒸发了。有报告显示,在过去的5年里,A股市场有可比数据的市值从28.24万亿元缩水至14.26万亿元(剔除期间上市的新公司因素),蒸发了约14万亿元,蒸发幅度约为五成;逾八成的投资者因投资股票致贫、返贫。所以,投资者担心在未来的8年里,股市会成为我国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绊脚石,拖国民致富的后腿。

8日下午,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十八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讨论会上发言时表示,不讳言中国资本市场仍存在问题,但要对市场发展抱有充分信心,可以预见中国资本市场必将迎来持续、稳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必将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作出更大贡献,必将为广大投资者带来更稳定更丰厚的投资回报。

但投资者如何能够得到一个“更稳

定、更丰厚的投资回报”呢?如何让郭树清主席的表态能够真正地落到实处呢?参照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目标,在股市或在资本市场制订一个“投资者收入倍增计划”是很有必要的。

应该说中国股市并不缺少发展目标,但这些发展目标更多的是一种“融资目标”。如金融业的“十二五”规划明确规定,要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例,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比重拟提高至15%以上。而郭树清主席更是在2012年第10期的《行政管理改革》上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成就、问题和前景予以总结和展望。明确提出了五大“十二五”规划及未来长远发展目标。其中在“十二五”规划及未来长远发展目标中,提出了一个很明确的融资目标。即社会融资结构全面优化。直接融资比重显著提高,争取“十二五”期末直接融资比重能够占到社会融资总量的30%-40%。至于投资者收入目标,基本上还没有纳入到管理层考虑的范畴。鉴于股市过

去长期存在的让投资者致贫效应,因此,面对十八大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目标,以及“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要求,股市有必要提出投资者收入倍增计划,为国民收入倍增目标的实现添砖加瓦,至少不拖后腿,同时增加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信心。

不仅如此,制订一份投资者收入倍增计划,这也更有利于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中国股市之所以带领投资者致贫、返贫,背离健康发展的道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股市是为国企脱债解困服务的,是为融资者服务的。股市过于看重融资功能,而忽视了投资功能,重融资而轻回报。投资者的利益根本就得不到保障,更没有切实地考虑投资者收入增加的问题,而只是一味地向投资者索取。因此,在十八大提出国民收入倍增目标的大背景下,股市有必要制订一份投资者收入倍增计划,正本清源,还原中国股市的本面目,让股市回归到正确轨道上来。

(文宇整理:陈靓)